

宏觀問題之考察 ——以唐宋詩優劣、異同論為例

第三講的內容是「宏觀問題之考察——以唐宋詩優劣、異同論為例」。做古典文學研究，當代學人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撰寫學術論文，這個我想在台灣和大陸學界都有一個共識，就是我們主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我們要發表的論文，它應該選擇一個比較小的題目，選擇一個很具體的題目，最好的論文的境界，可能就是像陳寅恪先生所說的「以小見大」，也就是一個小的題目挖掘得很深，探究出比較重要的意義來，這是比較好的論文的模式。假如是寫一個很寬泛的題目，我們一般稱之為宏觀研究的話，你很難寫好一篇論文，因為在一篇論文有限的篇幅之中，你不可能就一個非常寬泛的主題深入的討論，必然是點到為止。那麼為什麼我今天還要安排這樣一個講題？因為我一、二、四講都是很具體的題目，唯獨第三講是比較宏觀的考察，有這樣的一種思考，這並不是寫一篇論文的內容，一篇論文很難把唐宋詩的異同談清楚，甚至一本長達三四十萬字的學術專著都不見得能談清楚，所以我們在短短的兩個小時中間，只能宏觀的談談這個問題。

不是說這個內容是可以來撰寫論文、做學術研究的一個形式，而這是做為一種考察，或是作為對知識背景的一種認知。基本上我是這樣考慮的，假如我們把這個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唐宋兩代的詩歌上，那麼不管是研究比較宏觀一點的題目，比如說整個宋詩的特點、研究整個宋代詩人在題材上的開拓、宋詩的風格和其他朝代有什麼不同、或是具體研究某個詩人，你研究北宋的梅堯臣、蘇黃，你要把它們說清楚，恐怕都離不開宋詩和唐詩的對照，一定要在這種對比的、宏觀的視野之下，我們研究的具體題目才能說清楚。因為我們對古代的詩人也好、整體的詩歌創作也好，我們要對它做一個評判，我們有什麼理由說某一個詩人特別偉大、某個詩人次要一點，種種評判一定是在比較的前提之下進行的，沒有比較說不清楚，就好像大家去百貨公司買東西，沒有比較的話你就不能說這個東西是貴還是便宜，一定要貨比三家，我們才能說這個東西很貴、這個特別便宜，或是比出這個貨物特別好，那個貨物質量不好，因此比較的工作在研究之中，即使一篇論文是針對非常具體的對象、很小的對象，但在這篇論文中做出判斷的時候，已經是做出了比較，你一定是把你的研究對象跟其他的詩人、其他的現象做對比，對比之後才能定位、才能夠有價值判斷，否則的話我們就很難說有什麼價值判斷。

我剛才是舉宋人的例子，反過來說，我們要判斷一個唐代詩人的價值、地位，是不是需要這樣呢？也是需要比較的。我們為什麼說唐詩是我們歷史上非常好的詩歌階段、唐詩是五七言詩鼎盛的時期？實際上就是把它放在整個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的過程中加以考察，上至

漢魏六朝、下至宋元明清，在這樣的比較中，我們就能夠判斷它非常了不起、成就很高，假如上面沒有漢魏六朝、下面沒有宋元明清，整個歷史上就一個唐代，那我們就無從說起唐詩好還是不好。具體地說唐代的某一個詩人也是這樣的，比如我們特別重視杜甫，為什麼？就因為杜甫不但其成就在唐代非常高，而且他對後代的影響非常深遠，杜甫對後代的影響是貫穿整個中國詩歌史的，學杜甫最有成就，或說最深刻的理解杜甫的，恐怕首先是宋代的詩人，所以一定要參照宋詩、參照宋代詩人對杜甫的繼承和變革，再回過來，就更能看清楚杜甫的意義。我的意思就是，不管我們將來要從事唐宋詩歌中間的那一方面研究，不論你的研究課題是多麼的具體，但假如想要把你的研究做得比較好的話，我們就應該對唐宋時代整個詩歌的情況做一個通盤的考慮，雖然不能說是全局在胸，至少須有一些了解。我們不能說我研究這個對象我就只讀他，他的前後左右我都不管，這樣不行，這樣就缺乏一種文學史的眼光。

回到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唐宋詩的優劣異同上來，為什麼產生宋詩以後，古人一直到今人，對於唐宋詩孰優孰劣、到底是異同在何處，有那麼多的討論，有那麼多的意見，大家為什麼非常關注這個問題？因為這兩個時代的詩歌，就像葉燮在《原詩》中間所說：「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不讀另一方，不了解另一方的情況，你也就了解這一方，兩者是既對立又相輔相成、互相依賴，因此我們宏觀的考察唐宋詩的優劣，或是說在這方面多儲備一些知識，可能對我們將來做具體的唐宋詩人研究會有幫助，反過來說假如我們在這方面很

不關心，我們在具體研究唐代詩人宋代詩人時，會比較難以做出正確的判斷，往往是眼光太小了、太有局限性，所以今天主要給大家講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這個問題首先是一個歷時性的觀察，就是關於唐宋詩的優劣異同，從宋詩產生以來就存在，我們大致把它分成三類，第一種是從宋代就產生、一直到現在都占主流地位、影響最大的「崇唐貶宋」，就是比較多的人認為，唐宋之間，唐詩是更高一籌，而宋詩的整體成就沒有唐詩這麼高，這種觀點從宋代就產生了，以下依時代先後，稍微做一個回顧。

大概在南北宋之交，張戒的《歲寒堂詩話》開始，就比較明確的點出了「崇唐貶宋」的觀點。當然我們可以問一問，為什麼在張戒以前，整個北宋的過程之中，這種觀點沒有出現、沒有完整的理論型態？我想原因可能是這樣，在張戒的時代，宋詩的詩風已經形成了，蘇東坡、黃山谷、王安石等人都已經出現了，而且都已經去世了，也就是說在張戒那個時代，他可以比較完整的來考察蘇軾、黃庭堅這幾位詩人，而這幾位正是我們認為最能代表宋詩特徵的，若問宋詩和唐詩有什麼不一樣、宋詩有什麼開拓？可能這幾位詩人有最好的表現。所以張戒這個時代就可以比較完整的觀察宋詩，當然也就可以比較完整的把宋詩和唐詩進行比較。在蘇東坡以前還不具備這種條件，宋詩的特徵還未形成、最高峰還未出現、自身特質還未形成，也就沒有辦法比較。當然，張戒的比較一出現，使我們這些宋詩研究者非常失望，因為他是貶宋的，他首先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宋詩最主要的兩個代表人

物——蘇東坡和黃山谷。《歲寒堂詩話》中說得很明確：「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就是從漢魏一直到北宋，這樣的一部完整的五七言詩歌發展史，張戒認為到了曹植的時候是發展得相當不錯的，到了盛唐李白杜甫的時候，發展已經達到極盛、已經完成了。下面一句有意思，「壞於蘇黃」，這個傳統的發展到了蘇東坡、黃山谷被破壞掉，詩歌沒有上升、反而下降、反而意義不大了，他下面又說「蘇、黃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唐人詩」，把蘇東坡、黃山谷的習氣都拋棄掉，然後才可以說唐詩，當然張戒是一個比較極端的復古主義者，他下面又進而說「唐人聲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六朝詩；鑿刻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這種觀點是禁不起推敲的，因為越古越好的話，那麼推到文字還沒有產生的時候，要怎麼說詩呢？他必然有一個起源，不可能說越古越好。這裡我們要看的是他對唐詩和宋詩的考察，他明確的說唐朝的代表詩人李杜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宋詩的代表詩人蘇黃把詩歌的傳統破壞了，他們的詩歌成就是不高的，這是一種非常鮮明的「崇唐貶宋」觀念。

張戒的理論提出後，影響還不是最大的，到了南宋，嚴羽寫《滄浪詩話》影響就更大了。因為嚴羽的《滄浪詩話》對後世的影響非常大。嚴羽的《滄浪詩話》基本上繼承了張戒的價值判斷，他同樣認為以蘇黃為代表的宋詩是不好的，比不上唐詩，所以他對於宋代的代表詩人有一系列具體的批評。他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諸公包括蘇東坡、黃山谷、陳師道等人，他們對詩歌的理解、非常的不合常規、不合詩歌本身的

規律，因為有了這種奇特的理解，他們的詩歌也有了奇特的表現，也就是嚴羽提出的「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他的意思是說，蘇黃這些人太關注文字了，在詩歌的語言層面花的功夫太大、太講究了。以才學為詩是說在詩歌中展現學問、在做學術上的思考。第二個議論為詩，就是詩歌不再只是抒情，而在詩歌中大放厥詞地議論、在詩歌中表達詩人對各種事情的見解、思考。嚴羽認為這三點就是以蘇黃為代表的宋代詩人的特徵，他認為這些是不好的，我們認為嚴羽提出的這三點雖不能代表宋詩的全部特徵，但他說得是比較準確、有一些道理的，他說：「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就是說蘇黃他們這樣作，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他們這樣雖然詩寫得也工，工，狹義來說當然是說工整，但古人說一首詩工，經常是取它的廣義，說它寫得好、寫得美、寫得漂亮，這就叫做工。他說：「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就是說蘇黃這些的人也寫得好的，但終非古人之詩，這古人主要是指唐人，嚴羽認為和唐人不一樣就是不好的，在他心目中唐詩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典範，你要違背它就是不好的。再往下，《滄浪詩話》說得更清楚了：「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就是詩歌發展至蘇東坡黃山谷，他們不再遵從傳統，他們根據自己對詩歌的理解、思考來寫詩，這樣唐詩的風格、風氣就改變了。在嚴羽看來詩歌最好的傳統是唐詩的傳統，而蘇黃恰恰是變革了唐詩的傳統。所以嚴羽就對以蘇黃為代表的宋詩進行批判、認為宋詩是不好的。這樣的一種以宋人張戒、嚴羽為代表的觀點，他們對宋詩有不好的批評，那麼在其他朝代譬如金代，

王若虛在《滄南詩話》裡也這樣說：「散文至宋始是真文字，詩則反是矣。」就是古文發展到宋是非常好的，詩則不行了，不是真文字，性情不真，也就沒有價值了。

這種觀念到了明代更加厲害，我們說張戒和嚴羽對宋詩的批評，在我看來是偏頗的，但還是有道理的，能夠說出原因、緣由來，到了明代，明人貶低宋詩、推崇唐詩的一些言論，經常給我們的感覺是沒有充分的道理、沒有交代原因是什麼，僅僅是粗率的表態，我們看看從宏觀上面否認宋詩最徹底的、話說得最難聽的，往往是明人說的。舉幾個例子，李東陽說：「宋人於詩無所得。」宋朝人是不理解詩的，他們在詩上沒有什麼收穫，所以也寫得不好。陳子龍說：「終宋之世無詩焉。」他說整個宋代根本就沒有詩，我們知道現在北京大學編的《全宋詩》已經出版了，有二十四點七萬首，怎麼會無詩呢？他的意思是說沒有好詩，宋代雖然寫了那麼多詩但沒有價值，等於是沒有寫，他的否定是非常徹底的。所以我覺得明朝人在否定宋詩時，就像明代的學術一樣，比較空疏，態度非常激烈、旗幟鮮明，但沒有經過仔細的論證，我們看不到多少說理、原因的交代。

下面看一個比較有趣的例子，明人楊慎在他的《升庵詩話》中記錄了這樣的一個故事，他說他有一個好朋友叫何景明，前七子之一，何景明經常說：「宋人詩不必觀。」剛剛我們說陳子龍說宋代沒有詩，何景明承認宋代是有詩的，但這個詩不好，所以沒有必要去讀它。楊慎聽到何景明這樣說後，他覺得不服氣，你怎麼這麼簡單就否定了一代之詩，宋代三百年那麼多詩一句話否定好像太粗暴，楊升庵就故意

在宋詩之間挑選了四首七言絕句，寫在一張紙上，當然作者的名字不寫，只把詩題和文字寫在上面，然後拿給何景明看，問他「你看看這詩寫得怎麼樣呀」，何景明不是說宋人之詩不必觀的嗎，何景明因為楊慎紙上沒有寫是誰寫的，光看四首七言絕句，他說好、這詩好。楊慎問他這詩是哪個時代的詩人寫的呢，何景明說這還用問嗎，這樣好的詩肯定是唐朝人寫的，這是唐詩。楊升庵就把原詩翻出來給他看，四首全是宋人寫的，是典型的宋詩，這就說明何景明先判斷宋詩不足觀，但楊升庵在宋詩中挑出四首好的給他看，他又非常讚賞，認可是唐朝人寫的，他對宋詩沒有經過仔細的閱讀、評判，就簡單的做出結論。這個故事還有下半段，楊升庵給他看這是宋詩，何景明死不認錯，又拿起來說：「細看也不好。」那我想他這個細看也不好，他是知道這是宋詩，先入為主了，告訴他這是宋人寫的他就說不好，不告訴他這是宋人寫的他就說好，因此這樣一種崇唐貶宋的言論，不是一種很學術化的意見，是比較粗暴的判斷，可惜這樣的一種觀念一直影響很大，最後舉一條清人吳喬說的：「宋之詩最著者蘇、黃，全失唐人一唱三歎之致。」他們都認為唐詩有一種言外之意，讀完之後有餘味，宋詩則缺乏餘味，寫得太透、太露，所以不好，這種觀念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現代還是流行的，我想這可能是雙方面的，一方面學術界持這種觀念的比較多，第二，一般的閱讀者讀詩確實先接觸唐詩，很少有哪個人說我唐詩讀得很少，主要讀宋詩，一般先是讀唐詩三百首，然後慢慢擴展到宋，所以大家即使不完全否定宋詩，不像李東陽、何景

明那樣一概否定，但大家還是覺得宋詩和唐詩比總是差一籌，唐詩總是高一點，宋詩總是低一點，這是第一方面的一種觀念，崇唐貶宋。

第二是相反的觀念，宗宋的觀念，認為宋詩比唐詩更好的觀念。如果從時間上來看，第二方面的的觀點比第一方面的觀點要稍微晚一點，大致上是南宋的後期，比較早是劉克莊，他沒有明確的表達他的看法，但他有一本有名的《千家詩》，是很流行、很通俗的詩選，他是第一部選宋詩多於唐詩的詩選，當然我們不能根據選本就說劉克莊推崇宋詩，認為宋詩比唐詩更高明更好，因為《千家詩》是給兒童讀的通俗讀本，可能因為宋詩比較淺近，所以他選了比較多的宋詩，而且劉克莊在他本人的文字當中也說過貶低宋詩的話，我舉一個例子，劉克莊在一個詩序中說：「本朝文人多，詩人少。」當然不是說宋朝詩人少，而是說宋朝好的詩人、成就高的詩人少，還是比不上唐代。

真正對宋詩作出比較高的價值評判的應該是宋末元初的方回，我舉出了方回的《瀛奎律髓》這本書，方回的言論也見於他的一些詩序等等，最主要見於選本。這裡我們可以看看方回的選本，特別是《瀛奎律髓》這本書的成書年代。方回其人人品是不足論的，在元軍南下以後很快就投降了，還做了一任蒙古的官，人品是比較差一點，但他的《瀛奎律髓》呢，我們不能因人而廢言，因為這個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律詩選本，對後代的詩歌創作影響非常大，我一直對南京大學的同學說，假如你想要學會寫五七言律詩，你就讀《瀛奎律髓》，把《瀛奎律髓》翻它幾遍，你自然就會寫了，他選的是唐宋兩代的律詩方面的好作品，而且是按題材分門別類的，這部書是非常典型的表現出來

對唐宋詩整體價值判斷的選本，這部書的成書時間也很有意思，他成書於至元 20 年（1283 年），距離南宋滅亡、陸秀夫殉國、蒙古軍隊佔領整個中國那個年代四年，為什麼這個時候成書的《瀛奎律髓》首次提出在文學史上對宋詩的肯定，因為在這個年代人們才可能完整的來考察宋詩，因為宋代已經滅亡了，在以前的任何考察，像劉克莊、嚴羽，他們本人還活在宋代，蘇東坡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你還在那個中間你是看不清楚事物的全貌的，一定要跳出那個地方，有些距離，才可能完整的考察。所以在宋亡四年後編的《瀛奎律髓》在邏輯上就提供了這種可能性，他可能完整的回顧宋詩，也可能完整的把宋詩和唐詩來進行價值的對比。當然，方回的這種價值觀，主要是透過他的「選」來提出的，魯迅在三十年代的時候曾說過「要考察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要考察一個時代的文學理念，最好的不是看這個時代的人說了什麼話，不是看這個時代的人在文學理論上發表了什麼文章，而是看這個時代的選本，看這個時代的詩歌選本、散文選本選了什麼作品，選目最能體現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我覺得這話講得非常對，方回的《瀛奎律髓》雖然僅僅是唐宋兩朝的律詩選本，因為他是比較重要、全面的選本，所以他也是對唐宋兩朝詩風作了整體性的對比評價的好的文本。我們簡單介紹一下《瀛奎律髓》在這方面的特點，首先方回的《瀛奎律髓》在選作品的數量上重視宋代超過唐代，《瀛奎律髓》入選的唐代詩人有 163 人，宋代詩人有 217 人，全書共 380 人，其中宋代文人佔 57%，宋代詩人的入選人數超過唐代。再看看作品的數量，《瀛奎律髓》入選的唐詩一共 1227 首，宋

詩 1765 首，全書一共 2992 首，從這兩個數字看，入選的宋詩佔全部作品 59%，宋朝的分量超過了唐代。下面再看看他對重要詩人的選目，我取了這樣的標準，取了二十首以上的就是方回心中的重要詩人，那麼我們看看唐代宋代各是什麼樣的情況，唐代一共選了以杜甫為首、白居易、賈島等十二人，很明顯缺席的人是李白，這沒有什麼稀奇，因為《瀛奎律髓》是律詩選本，他不選絕句不選古詩，只選律詩，而李白很少寫律詩，所以李白不在內，前五位的作品數我也印在講義上讓大家看看。入選二十首以上的宋代詩人的名單正好是唐代詩人的兩倍，《瀛奎律髓》選宋代詩人超過二十首的有 24 人，這裡哪位同學想深入思考、寫一篇小論文的話可以關照一下這個問題，就是在方回提出來的宋代詩人名單上，蘇東坡、黃山谷不在前面，他們的名字都排在比較後面，這是什麼原因？很多人都說方回是一個江西詩派的理論家，他為什麼不把黃庭堅選最多，陸游梅堯臣和陳師道卻選得最多？這和唐宋詩的整體優劣異同沒有關係，我們就不細講了。在方回看來，宋詩的整體成就是決不亞於唐詩的，從個人來說，杜甫 221 首超過宋代的第一人陸游，但是從整體來看，方回覺得宋詩是不亞於唐詩的，他選的作品、詩人都是宋代多，重要詩人更是唐代的兩倍，所以方回可以說是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為宋詩聲揚，他不否定唐詩，但認為宋詩不亞於唐，可以跟唐詩平分秋色。這種觀點每個時代都有人繼承，同樣到了明代，這種觀點就是非理性的，我下面舉的例子是明代公安三袁的袁宏道，袁宏道說：「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都說唐詩好，我偏要說唐詩不好，唐無詩。

又說：「世人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世人都說宋元詩不好，我偏說宋詩好，就像李夢陽他們否定唐詩的不理智言論一樣，袁宏道也是故意唱反調，沒有細緻的論證，明代的學風都有這樣的特點。

到了清代，清人寫詩雖有不同流派，清代比較多的詩人在寫詩談詩的時候都比較重視學術，學問勝過詩歌的現象在清代比較重，比較有代表性的像翁方綱，翁方綱就是高度的肯定宋詩，他是個肌理派，他認為詩到了宋代比較細膩，唐詩則比較粗放一些，所以他認為宋詩的成就不是唐人所能規範的，宋詩超越了唐詩，這種觀念到了晚清、民國初年，隨著宋詩派在詩壇上佔主要地位，在學人、詩人中間也就成為比較流行的主要觀點了。下面舉個小說裡的例子來看看，錢鍾書的《圍城》，我想臺灣的同學也不陌生，這個書大陸因為有電視劇，所以一般人都看，是很精采的小說，我不認為《圍城》是偉大的文學作品，他是一個學者寫的一個機智的小說。《圍城》裡面寫到在淪陷時代，就是抗日戰爭時的上海，一批留學生、知識份子交談，曾經說到這樣的情節，有一個名士派、實際上是同光體的一個詩人，叫作董斜川，是小說裡的人物，他在哪裡高談闊論談舊體詩，他就說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詩人可以用一種地理學上的名詞來代表，可以稱為「陵谷山原」，陵谷山原當然都是地理學上的名詞，他說的陵谷山原是哪些人？陵有三個人，第一是杜少陵，第二是王廣陵，這個人可能大家稍微陌生一點，董斜川說了以後就問大家知道這個人嗎，王廣陵就是北宋詩人王令，這個詩人在文學史上地位不是很高，但當時水準相當不

錯，他跟李賀一樣很短命，二十八歲就死了，才華來不及完全施展開來，就早早去世了，王令也是王安石最好的朋友、最器重的一個人。所以後來學界有人說王令如果不早死，能成為王安石重要助手的話，王安石變法也許不會失敗得這麼慘。第三個梅宛陵就是梅堯臣，所以我看看三陵，只有第一個陵是唐人，後面兩個都是宋人，宋比唐多。再來看看二谷，一個是李昌谷，唐代詩人李賀，一個是黃山谷就是黃庭堅，唐代一個谷、宋代一個谷，剛好平分秋色。四山，第一是李義山李商隱，第二是王半山王安石，第三是陳後山陳師道，陳後山和王半山這兩個都是北宋詩人，第四個元遺山是由金入元的詩人，他的時代跟宋朝是並列的，先不管。宋代有兩座山，唐代只有一座山。最後一個原是陳散原，他是清末民初人，和唐宋沒有關係。也就是說在董斜川心目中，中國古典詩歌史上最重要的一批詩人中，唐朝只有三個人，而宋朝有五個人，也就是宋詩的整體成就是超過唐朝的。當然當時董斜川說了這些話之後，學問不太好的方鴻漸就在旁邊小心翼翼的問，陵谷山原，都是地理學的名詞嘛，能加一個坡嗎？也是一個地理學名詞。董斜川就盛氣凌人的說「蘇東坡嗎？他還差了一點。」把方鴻漸嚇得半死，蘇東坡還排不進去，這句話也把我嚇得半死，蘇東坡怎麼排不進去？也就是說在晚清宋詩派這些人看來，宋代詩歌最重要代表還不是東坡，是黃山谷、王安石、陳師道這些人。到了董斜川這個虛擬的名字，他實際上是錢鍾書的一個朋友，是當時的一些詩人，他們心目中宋詩是不亞於唐詩、超過唐詩的。我們整體回顧一下，歷

代崇揚宋詩的一些人，跟歷代崇唐貶宋的一些人是差不多的，他們也是有些偏頗，有些意氣用事的。

第三種情況我就把它稱為歷史主義的觀點。還有一種觀點不是簡單地說唐詩還好還是宋詩好，它把唐詩和宋詩都放到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過程中間去看，是一種歷史主義的考察方法。我個人是比較贊成第三種觀點的，比較實事求是、比較超脫。我們看一下大致上有些什麼論點，這個觀點產生得比較晚一些，大約在清初開始。

首先是吳之振，他編了一部《宋詩鈔》，這也是後代人比較用力氣來蒐集整個宋詩的一個集子，吳之振在〈宋詩鈔序〉序裡說：「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就是宋詩不是完全跟唐詩不同，是從唐詩變化出來的，他雖然是唐詩變化出來的，但是有自己的理解，不完全和唐詩一樣。這話和李東陽說的：「宋人於詩無所得。」再跟嚴羽的話比比：「東坡、山谷，始出己意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嚴羽認為宋朝人變了，根據自己的理解改變了唐詩的傳統所以不好，而吳之振他們則認為宋詩既對唐詩有繼承，又有自己的理解，所以它好。下面說得更精采，他說宋詩和唐詩的關係是「皮毛落盡，精神獨存。」皮毛只是外表，精神是內在的本質，他認為宋詩和唐詩不同的僅僅是外表，外表形式上有種種不同，題材、語言有不同，但是精神、作為支撐詩歌層面的價值，作為一個好作品之所以為好作品的內在精神，他是沒有改變的，也就是說在吳之振看來唐詩好，宋詩也好，這兩者一脈相承，在根本的價值上沒有改變，改變的僅僅是外在的形式而已，我覺得這說得非常好。同樣是

清人的邵長蘅說：「詩之不得不趨於宋，勢也。」這句話也說得很好，他認為唐詩演變發展最後會發展成宋詩，發展成和唐詩面目不大一樣、甚至相去甚遠的宋詩，他認為是「勢」，勢是一種規律、趨勢，不可違抗的，所以邵長蘅認為詩歌從唐詩變化到宋詩是必然的，這點說得非常好。還有一個人也說得很好，葉燮的《原詩》，在清代的眾多詩話中間，清代詩話非常多，已經出版有《清詩話》、《清詩話續編》，實際上有八百多種，一般認為這麼多清詩話中最具有理論色彩的是葉燮的《原詩》，葉燮原詩在理論上有嚴密的體系，他對唐宋詩、整個中國詩歌史的發展有一些理論、有一些非常精到的表述，下面我引這樣的一句話，他用了這樣的比喻，他說一部詩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就好像樹的生長過程，他說三百篇是其根，詩經是最早的源頭；蘇李也就是相傳為蘇武李陵寫的那些詩，最早的五言詩，跟古詩十九首差不多時代的，這些詩是其芽；建安詩，三國魏代，也就是三曹父子、建安七子，樹就長得比較粗一點了；六朝是其枝葉；唐詩則枝葉繁茂；宋詩則正在開花，這棵樹長到宋代就開花了，他認為開花以後，樹的生長過程就完了，宋以後的詩在他看來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開，重複這些過程，一個完整的過程已經結束了。葉燮這個比喻非常精采，我覺得美中不足的是，樹木的生長過程中還有一個結果，他如果能修改一下，修正成唐詩開花、宋詩結果就更好，事實上我們現在讀唐宋兩代也詩，也是唐詩更像枝頭的繁花，而宋詩他的價值在裡面，更像外表不那麼美麗，內在有利用價值的果實，所以假

如他改成唐詩開花、宋詩結果就更好了。可惜葉燮距離我們已經太遠了，沒有辦法把我的意見貢獻給他。

所以就歷史主義的觀點，客觀地看唐宋詩的異同，不是機械地把它對立起來說誰好誰不好，是把它放在整個詩歌史的發展過程中進行考察，這樣的觀點我覺得是合理的。跟葉燮這段話類似，表述得更精確的可能是聞一多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聞一多先生在昆明西南聯大給學生講唐詩，他的講法被學生鄧臨川記錄下來，後來整理成《聞一多先生說唐詩》發表了，後來有另一個版本，也記錄了聞一多先生的一些觀點。

插一句話，西南聯大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我們的大學辦得這麼多，後來有很多的發展，西南聯大是八年抗戰中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個學校流亡到昆明去的一部分師生組成的臨時大學，抗戰勝利後就遷回北平和天津。他在學術上達到的學界是非常高，大陸學界在回顧大學沿革的過程的時候，一說就說到西南聯大，西南聯大不只人文科學好，物理化學也相當好，那時候他派出去的留學生或者外訪學人，被英美大學不加考慮就接受，認為和他們的程度沒有任何差距。以後不管是抗戰勝利以後，還是以後，大學經費更充裕、校園更漂亮、蓋了很多大樓，但是我們大學的整個學術水準不可思議的下降了，再也不能重現西南聯大的輝煌。這是使我們今天全體大學教授覺得臉上無光的事情，有這麼好的條件，不再有飛機轟炸的隆隆聲，西南大學的教授經常躲炸彈，沈從文跟在劉文典後面跑，那時候研究古典文學的老師看不起現代文學的老師，劉文典回頭

一看沈從文就說：「我逃是我死了就沒有講莊子，你逃什麼？」當時他們整個西南聯大的教學都在動盪的情況之下，經費相當困難，甚至教授都沒有足夠的營養，吃不飽飯，但是學術、教育做得那麼好，我們今天大陸雖然還不大富裕，但教授大致上都衣食無虞，生活上沒有什麼憂慮，偏偏學術下降了，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回到聞一多先生的觀念，聞一多先生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講唐詩，他講了一個觀念非常重要，他說中國古典詩歌史的重要分界線不是在唐宋之間，不是在西元 960 年趙匡胤陳橋兵變、北宋成立那年，我們一般都說唐代文學、宋代文學，唐詩、宋詩作為分界線，聞先生不一樣，聞先生說，他對詩歌史的考察，認為中國古典詩歌史前後期的分界應該是在唐天寶十四載，就是前段從漢代建安開始到唐天寶十四載（755），後段是從天寶十四載（755）往下推到 1920 年，1920 年就是五四運動的第二年，我們一般把五四運動當作現代文學的開端，但實際上在 1919 年以前已經有人在寫白話詩、白話文，但成為一個文化運動、獨領風騷還是從那時候開始，聞先生詩歌史的下限就是現代文學開始，古典文學結束。這個中點放在唐代天寶十四載，是什麼原因？我們知道這是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那為什麼安史之亂爆發，整個詩歌史也開始進入了新的時代呢？我後來思考這個問題，我想可能是這樣的，就是安史之亂爆發以後，盛唐詩歌也結束了，儘管一些重要的盛唐詩人還生存下去，但整個詩歌史有了重大的轉折，安史之亂以前，主持詩壇的可能是李白和王維，但是天寶十四載以後，杜甫的影響就非常重大，影響到中唐元白、影響到宋詩，所以聞先生把

分界點放在這裡。那麼聞先生說，唐代從中唐開始，包括中晚唐、五代跟宋代等等都是一個階段，沒有很強的階段性，很強的階段性是在天寶前後，這個觀念對我們有非常多的啟發，今天如果我們延續前人的論點來觀察唐宋詩的優劣異同，實際上這種考察的前提就是不夠準確的，因為實際上詩歌史的發展，唐宋之交不是一個分界線，就是我們在考察的結果是把文學史上後一個時期的中唐和晚唐都放到前面去了，而把宋代單單拎出來與唐代進行比較，這種比較是比較不科學的，因此這可能是歷史主義的來考察唐宋詩的異同，在近代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說法。實際上他的精神是，不要非常機械的把唐宋詩截然分開，應該說唐詩也好宋詩也好，都不過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的一個階段，兩者之間必然有繼承，也必然有變革的關係，不能簡單地說哪個更好，哪個更差些。

聞先生的觀點以後，我們後面再講唐詩宋詩，還是從風格上來講的話，講得最好的大概是錢鍾書先生。錢鍾書的《談藝錄》開篇就是說唐宋詩的異同，他的話非常的委婉，他說：「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就是人們經常說唐詩如何宋詩如何，把它看作一個朝代的文學作品，而在錢鍾書看來，它主要不是由於朝代，朝代只是打在這個時期詩歌上的一個標記而已，實際上真正的區別是表現在它的體格和性分。他下面又說：「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這話就說得更好了，不是說唐朝人寫的詩就叫唐詩，宋朝人寫的詩就叫宋詩。事實上我們也看得到這樣的例子，譬如說唐代的韓愈，或者唐代杜甫後期的詩，與其說他是唐詩，不如說他的特

點上更像宋詩。同樣宋代楊萬里的一部分、陸游的大部分，與其說它是宋詩，還不如說它在風格上更像唐詩。就是唐詩和宋詩實際上是風格的區別，所以就風格來看，唐代和宋代、唐詩和宋詩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一種交叉滲透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一種情形，不能簡單而粗暴的把它用兩個名字分開來，說這部份是唐詩，那個部份是宋詩，或唐詩如何、宋詩如何。我覺得這是說得更加圓滿的說法。

以上我們粗略的回顧了一下在文學批評史上關於唐宋詩優劣異同的代表性言論。我再補充一些內容，假如我們現在要考察宋詩的話，考量唐詩和宋詩之異，作為具體研究的話，除了詩歌文本本身，把文本進行對讀、分析處理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什麼情況？我的體會是，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唐代宋代詩歌發生的背景，就是這兩個時代社會的背景、文化的背景是有些變異的，這些變異對宋詩特點的形成是不可不談的，宋詩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除了詩歌內部本身要演變以外，還有一些外在的原因，尤其是外部的社會文化，這些促成了這些變革。

我大略舉出以下幾點，第一，要關注科舉，科舉，特別是以進士科考試為主的制度，是隋代發明、唐代開始實行，宋代開始規範化，唐宋都有科舉，唐宋也都非常重視進士科，但是唐宋的科舉有一點不一樣，這點不同對詩歌和文學都產生了影響。我們現在看唐代詩人的名單，假如從科舉的角度去看，我們發現有很多一流的大詩人不是進士、沒有考上進士，李白、杜甫都不是進士。但是我們考察宋人的時候發現情況就相反，宋代的大詩人不是進士出身的很少，最多只有陳

師道，陳師道沒考上進士是有特殊原因的，是由於他應該考進士的年代，正是王安石領導新黨執政的年代，新黨執政有一個意識形態上的特點，規定當時的科舉考試、對儒家經典的理解，一定要以王安石的學術為標準答案，就是你要符合新學，假如不符合王安石的理論，就一概不取。而陳師道特別的耿直，他就說我是舊黨，不贊成王安石的新學，現在新學為主，我就寧願不考。因此我們觀察宋代的詩人，絕大部分都是進士出身，這樣一種情況說明什麼呢？簡單的說，唐代的科舉是一種不很嚴格，沒有形成制度化的考試方法，唐代科舉錄取的人很少，有時候進士一科只有十幾個人，錄取很難，同時有很多不規範的做法，譬如說請人說情，我們看到唐朝人很多人考試以前就去找人說情，甚至包括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像王維也未能免俗，王維考試以前有人帶他去公主家彈琵琶，因為王維精通音樂嘛，彈琵琶給公主聽，公主一聽不得了，這個小夥子琵琶彈得很好，推薦的人說他詩歌寫得更好，公主拿來一看真的很好，推薦人就說他今年要科舉了，公主就去找考官說，這個小夥子才能這麼好，你不能不錄取他，王維就錄取了。杜牧也是這樣，杜牧考試以前還沒考呢，推薦人就去找考官了，考官說這比較為難了，今年第一名到第四名都有人了，只能第五名啦，所以杜牧就考上了第五名，所以還沒考名次就已經定了，不是很公正。可是到了宋代，科舉考試制度化、規範化，宋代的科舉考試應該說比較接近我們現代的考試，是糊名的，你不知道是誰。而古人用毛筆寫卷子的，看筆跡也認得出來，不像我們現在電腦打字認不出來，毛筆寫的容易認得出來，宋人為防止作弊，還謄錄，就是寫的卷

子不直接給考官看，政府雇了很多人來抄一遍，考官只看謄錄過的卷子，看不出來是誰寫的，因此宋代的科舉考試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公平、制度化的人才選拔。下面我舉兩個比較有趣的例子，第一，北宋的鄭獬，在倒數第二級的考試省試的時候，考官把他錄取為第五名，按照宋代的規矩，放榜以後，考上的人都要寫一個公文去向考官道謝，鄭獬考了第五名覺得不滿意，他覺得我應該是第一名，所以他寫了信給考官，裡面說：「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就說我的文采用武藝來比喻的話就是李廣，是飛將軍、最好的；又自比喻為杜牧，我這麼好的文章，像杜牧一樣的，只得第五。這文章傳到主考官手裡，主考官非常生氣，這學生不知好歹，錄取為第五名了還不滿意，還諷刺我，下一次要把他名次往下壓，壓得更低。沒想到殿試，收到卷子，他們不知道哪份是鄭獬的，又謄錄又糊名，找不出來，所以殿試結束，金榜掛出來，鄭獬果然是狀元。考官有心要打擊這個考生是沒有辦法的，非常嚴密。下面看一個反面的例子，蘇東坡有一個學生叫李廌，我們知道東坡門下有四學士、六君子，李廌沒有排進四學士，但有排進六君子，是東坡的重要學生。李廌科場不利，考了很多年都沒有考上，有一年蘇東坡做主考，李廌很高興，我的老師主考，別人也都說今年你一定可以考上的，你的老師做主考。沒想到東坡不知道哪份卷子是李廌的，看到有一份文章古文寫得很好，風格也有點像李廌的，結果拆出來不是他，是別人的，那一年李廌又落榜了。東坡做主考，李廌還落榜，那一年放榜以後蘇東坡就寫了一首詩送給李廌，表示我做老師本來應該照顧你，但今年竟然還是沒讓你

考上，他就寫了這樣兩句：「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從表面上看是說，像是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將、很有經驗了，真正要教你來鑑別的時候，卻還是眼花、認不出來、分不出好壞，他是安慰學生：你的文章是很好的，是我們沒有認出來，所以你落榜。這裡用一個典故，古戰場大家知道是唐代古文家李華寫的〈弔古戰場文〉，日五色則是唐代另一個作家李程寫的〈日五色賦〉，〈日五色賦〉就是李程參加考試所寫的一篇賦，是非常有名、考官非常讚賞的一篇賦。所以東坡這個意思就是雖然你李廌平常寫古文寫得很好，我們也經常表揚你寫得像〈弔古戰場文〉一樣很好，但真正上了考場，你儘管寫了一篇像〈日五色賦〉一樣好的賦，我們沒有認出來，來安慰他。不管怎麼說，他就是從反面說明宋代科舉考試是比較制度化、比較公正的，同時宋代的錄取名額也是相當放寬了，唐朝每科十幾名最多三十多名，而北宋最多接近一千名，一年錄取的人數擴大了很多，這樣一來，宋代有大量的讀書人、特別是出身窮苦的人，只要你好好讀書、考試成績優秀，你就可能通過進士考試而進入士大夫階層，因此宋代士大夫的隊伍也就是宋代的詩人隊伍，因為中國古代的作家主要就是士大夫組成，宋代的作家隊伍裡面比較多社會中下層的人，他們了解社會、關注民生，他們的人生態度、政治態度都和出生上層貴族的紈褲子弟不一樣，這就為宋詩注入了許多改變，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們要關注的可能是宋代的理學，我個人一直覺得大陸和台灣的學界相比，可能在思想史的研究上台灣是最佔優勢的，因為 49 年以後很長時間，大陸高校不許講經學、不許講儒學，傳統中斷了，

而台灣有牟宗三這一批學人傳承下來，所以這方面台灣是最強的。儘管這樣我還是稍微提一提。就是以濂、洛、關、閩為代表的宋代理學，對宋代文學，包括宋代詩歌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儘管理學家之間沒有一流的詩人，但是由於宋代理學是士大夫階層的整體的哲學思考、價值判斷，所以理學思想、理學家對文學的觀念對宋詩、宋人都有非常大的影響。我們今天看宋詩，說宋詩喜歡發議論、宋詩中比較多哲理性，跟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第三，就是宋代文化發達，我舉兩本書，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前者有時簡稱為晁志，後者有時簡稱為陳錄。晁志也好、陳錄也好，它們都是我們古代目錄學史上非常重要的目錄學著作，它的重要不在於裡頭著錄的書多，或者裡頭有著名的版本，而在於晁志和陳錄以前，我們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目錄學著作，記錄的幾乎都是皇家圖書館的藏書，紀錄的是皇室、朝廷的藏書，而從晁公武和陳振孫開始，他們記錄的是私人的藏書，他們將自己的藏書作一個書目、目錄學著作，這就說明宋代文化發達、宋代書籍普及。在宋以前，唐代或更早的魏晉南北朝，人們家裡要有很多藏書是很困難的事情，一般人不可能有，家裡能有一些書是非常了不起了，因此產生一個結果就是，唐朝詩人讀書的廣博程度、他們學問的精深遠遠比不上宋人，所以唐朝杜甫說了一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傳為美談，大家非常欽佩，而宋代詩人，哪個不讀書破萬卷？因為宋代文化發達、印刷術普及，所以這種情況對於宋代詩人的學者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宋代詩人常常又是學者，學者難免好議論，他們說以學

問為詩、以議論為詩，他們的學養一定會表現在創作中，這是宋詩不同於唐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最後我引了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話，大家都知道他研究的主要對象除了晚年是研究錢謙益、柳如是以外，他早年是研究隋唐，可以說是一個隋唐歷史的專家，可是陳寅恪先生對宋代文化是非常推崇的，他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他不是說造極於唐，他認為宋代中國文化才登峰造極、發展到了極致，同樣，李約瑟也有這樣的判斷，他整個地考察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史，認為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是純科學的東西還是技術層面的東西，它的主焦點、突破點全部在宋代，不是在唐代。所以無論是科技文化還是人文文化，宋代都是一個文化空前發達的時代，我們以前經常拘泥於近人說的宋代積弱不振，好像覺得宋代是一個比較低潮的時代，這是一種錯覺，宋代的文化非常了不起。那麼這種文化的發達、文化的高張，它對文學創作、詩歌寫作必然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可能這就是嚴羽說的「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等等宋詩特點產生的原因。所以我們今天假如要把宋詩的研究做得比較好，要考察宋代的詩人、宋詩的某一方面特點的話，就是不要忘記這些宏觀的背景，往往這些文化、歷史的制度背景，對於宋詩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就暫時講到這裡，最後的時間開放給大家，我們一起進行學習討論，謝謝大家。

微觀問題之研究 ——以錢、朱注杜之爭為例

我們今天講微觀問題，有一個例子，就是清初的杜詩注的一個延伸甚久的公案，也就是說錢謙益的杜詩注和朱鶴齡的杜詩注，以至由於這兩家注之間所產生的各種糾紛、各種矛盾。這樣一個個案作為例子，來看一看我們在研究這些微觀問題時應該怎樣做。

我想講學也好，同學們自己閱讀論文也好，最重要的不是要接受他的結論，因為結論是隨時可以修改的，每個人的看法也不一定一樣，實際上最主要的還是關於一些方法的探討，就是看看我們怎樣能夠面對一個具體的問題、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引導出結論來，那麼這個也許比結論本身更有意義的。

今天這個演講的內容基本上源於我寫的一篇論文，題目叫做〈朱鶴齡杜詩輯注平議〉，這篇文章是發表在大陸中華書局一個刊物叫做《文史》，2002年的第四期。我覺得講這個專題對台灣的大學也許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這篇文章是在台灣寫的，是我2001年在清華客座的時候寫的，是因為在台灣讀了台灣出版物之後才想出要寫的。

我在 2001 年秋天到清華客座，第一天就去看了他們人文社會學院的圖書館。看了以後心想有這麼多的書，於是下定決心這五個月堅決不讀大陸書，五個月全部讀台灣的出版物，所以五個月間，讀了比較多的台灣出版的關於古典文學的著作，包括古人文集整理的出版物，更多的可能是台灣學者的研究論著。其中我讀的古人文集就包含朱鶴齡的杜詩注，書名叫做《杜工部集輯注》，這本書在大陸一直沒有正式出版，大陸當然有這本書，但是它是線裝書，線裝書收藏在圖書館裡不能借出來，所以我沒有能夠從容的讀，而台灣的是出版過此書的，所以我把它借回宿舍去讀，讀的就比較細一點。讀朱鶴齡的注以後同時我又讀到了台灣學者簡恩定的一部研究著作，叫做《清初杜詩學研究》，是文史哲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因為台灣的出版物在大陸都不能很及時的被我們看到，因此也是到台灣以後才讀到這部書的。

讀了簡恩定先生這部書以後，發現裡面比較多的篇幅是談到了杜詩的錢謙益注跟朱鶴齡注的關係的問題，特別是對錢朱兩家打筆墨官司來互相爭論的問題做了比較多的論述，就引起了我的興趣，所以後來就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文章已經發表了，同學們假如對這個問題本身比較感興趣的話，可以去讀那篇文章，我今天是講當初我要寫這篇論文的一個初步想法，或者是說我的思路是甚麼樣子。

清初的錢謙益和朱鶴齡各自都有一部杜詩的注釋，我們都知道杜詩的研究自從宋朝以來杜詩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杜詩的注作，古人說千家注杜，有人說五百家注韓，就是韓愈的古文有五百家為他作

注解，杜詩有一千家為他作注解。非常多的杜詩注解，構成了一部杜詩學的發展史。因為歷代的注家，他們在注釋時不僅僅是注解典故注寫作背景，同時也把他們對杜詩的一些理解、對杜詩價值的評判，體現在注本中間。所以我們假設讀杜詩注本從宋注本讀到明代不完整的注本，然後一直讀到清注本的話，可以看出這樣一個學術發展的脈絡。所以我一向很重視各種重要的杜詩注本。在清代注本中間，錢謙益的注本跟朱鶴齡的注本應該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偏偏又巧，這兩個人因為杜詩的問題先是合作，後來鬧翻了，關係破裂了，後來不合作，各注各的，互相說一些不好聽的話、互相指責對方，鬧得非常厲害。當時兩人的紛爭把很多人都捲進去了，有的幫錢謙益說話，有的幫朱鶴齡說話，後人也經常為了這個問題發表種種評論，所以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杜詩注解的問題了，而是古典文學學術史上的一個公案，到底是非如何真相如何？我覺得有必要把它的線索，把它的來龍去脈詳細整理。

錢謙益跟朱鶴齡這兩個人雖然是同時代的，但是他們年齡不同，他們當時在文壇上、在學界的地位也不相同。錢謙益比朱鶴齡年長得多，錢謙益是出生於 1582 年，而朱鶴齡是生於 1606 年，也就是說錢謙益比朱鶴齡年長 24 歲。當朱鶴齡開始從事他的學術工作時候，錢謙益已經是學界領袖，當時在文學界名聲非常大，因為他詩文都寫得很好，學問也很精深，因此這兩個人當時在學界的地位是不對等的。錢謙益已經是前輩，而且是學界的領袖，而朱鶴齡是後生，在學界當時是默默無名的。他們兩個人之間因為注杜，首先是合作，而後來又

鬧翻破裂。一般來說，兩個人的地位是不相等的，錢謙益處於優勢的地位，朱鶴齡處於一個劣勢的地位，錢謙益可以來指責朱鶴齡，而朱鶴齡不敢多加辯駁，只能替自己做一點辯護而已，兩個人的關係大致上是這樣的。

我們在錢朱之爭，尤其是關於杜注之爭中間看到的好多材料，往往是錢謙益以一種盛氣凌人的態度說話，很看不起朱鶴齡，當然因為朱鶴齡是後輩，也就是他一開始在學界的地位是不高的，因此後來就造成了很多的矛盾，也就形成了這樣一個文學史的公案。錢朱因為杜注產生的一些矛盾，後來有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這是歷來的學術界都這樣認為，大家也有這樣的看法，但是其中是非的問題，到底這兩個人為什麼一開始合作了，後來又鬧翻了，後來不是出一種注本，兩種注本又不一樣，然後又互相指責，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這裡面的是非到底怎麼樣？我認為這個問題還是需要深入下去，因為我看到的像簡恩定先生對於朱鶴齡、朱注本的指責基本上是不符合事實的，還需要再探討。

因此，當我考察這個問題的時候，先確定一個前提就是：錢謙益是個大學者，錢謙益的杜詩注本肯定是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的，所以我們要簡單的介紹一下錢注本。

其實最初錢謙益沒有做、也沒有想為杜詩做一個全面的注本，他僅僅是為杜詩某些重要的作品寫了一些意見，就如同他寫的文章〈杜詩小箋〉和〈杜詩二箋〉，這兩篇文章比較早，是在明亡之前，在崇禎 16 年，公元 1643 年已經刊刻，見於他的文集《初學集》，那個時

候錢謙益已經 62 歲了。錢謙益活得比較長，他活到 83 歲，這個時候他還沒有想為杜詩做一個全面的注本。過了若干年以後，具體的說就是到了 1655 年，也就是到了清順治的時候，1655 或 1657 之間，大概這三年之間，錢謙益認識了朱鶴齡，他知道朱鶴齡有意要為杜詩做一個全面的注解，錢謙益就將他對杜詩的一些的意見，一個稿本交給朱鶴齡，說「你幫我去注一下」。錢謙益是大學者，不耐煩一首一首的做注解，所以把草稿狀態的一些重要篇章交給朱鶴齡，要他去完整地整理。但是後來兩個人分手了，各自作各自的，關於這個部分我會在後面加以敘述。

我們現在看到的注本是兩家注，錢謙益的注本是完全獨立的，錢謙益的注一字都不提朱鶴齡，他是與朱鶴齡鬧翻了以後才做的。我們現在看獨立的錢注，也就是錢謙益的杜詩注，看有什麼特點或優點，或者是缺點。大致上是下面這幾點，我簡單的介紹一下，不是具體的講錢注。

首先，錢注不是每一首杜詩都有注。現在的杜詩大概是一千四百多首，但是錢謙益有 548 首是一個字也沒有注，他為什麼沒有注呢？怎麼有三分之一的杜詩沒有注？其實就是錢謙益看了這些詩之後，認為這是不需要注的。他一讀就懂，因為錢謙益是大學者，學問大，認為學者應該都有這個文化水準的，一讀就懂不需要注。所以有 548 首我們稱之為「白文」，白文就是根本不注的，只有原文。其他的九百多首杜詩他是有注的。杜詩號有千家注，從南宋以來已經有了很多種重要注本出來，就是說在杜詩注釋學當中前人積累的成果已經非常多

了，但是錢謙益目空一切、目中無人，他認為以前雖然有很多杜詩注，但水準都很差，都是錯誤的、不準確的。所以他在略例（相當於前言）中說，以前的注都是不對的、都是不好的，他認為他的注是有一種開創性的。但他的注是不是達到他自己追求的標準，應該說有一部份是達到的。

錢謙益長於唐代史地之學，也就是唐朝的歷史、唐朝的地理這些學問，他非常精通。所以他在注杜甫的作品的時候，對於杜詩中間所反映的時代背景，我們都說杜詩是詩史，杜詩的最大意義就是他的詩歌反映了一朝歷史，錢謙益對杜詩的寫作背景、對於與當時國家大事件有關的背景他注得特別清楚，或者說在這些杜詩的闡釋中，錢謙益的看法確實是超越前人的，有比常人的看法更加深刻的理解。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諸將〉五首的第五首。杜甫在近體詩的寫作上有很大的貢獻，因為近體詩篇幅有限，不管是律詩也好絕句也好，篇幅都是非常短的。所以假如要用近體詩要來表達豐富的內容、表達重大的題材，往往會覺得篇幅太短了，容納不下那麼豐富的內容，所以杜甫就創造了一種形式叫做「組詩」。當然組詩是後人的說法，當時的人稱為「聯章詩」，就是由幾首律詩、幾首絕句放在一個標題之下，這樣就擴展了近體詩的內涵。杜詩中著名的〈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秋興〉八首都是這樣。

關於這個〈諸將〉五首的第五首歷來的解讀都不夠準確、不夠深入，我把文本打印在講義上，我們簡單的念一下吧。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
中使望鄉臺。

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
須仗出群材！

〈諸將〉五首都是詠當時的一些重要將領，那麼第五首就是就是詠嚴武的，嚴武是杜甫在成都時對他照顧有加的一個長官，也是成都的節度使。掌握四川的軍隊，是一個重要的將領。

從字裡行間看，這首詩體現了杜甫對於嚴武的歌頌，在杜甫心目中，嚴武是一個正面的形象。嚴武管理地方治理得很好，也善於治兵。在嚴武鎮守四川的時候，吐蕃等少數民族是不敢侵犯四川的，因為嚴武很會帶兵、也很能打仗，所以杜甫寫詩歌頌嚴武。但是問題是，〈諸將〉五首前面四首都是諷刺當時的諸將不能安邊定國，他們帶的軍隊不能保家衛國，唐朝受到少數民族的侵犯、國家還是動亂。那麼問題就來了，諸將五首這一組詩，前四首的主題跟第五首的主題是游離的、是矛盾的，好像不符合杜甫組詩的一般的情況。杜甫的組詩通常有一個統一的主題，然後各首分別有各方面的內容。〈諸將〉五首好像有一點矛盾，為什麼前面四首都是批評當時的諸將，他們沒有能力保家衛國、沒有盡到責任，而第五首卻是從正面讚美一個將領嚴武，好像有點不一樣，我們看看錢謙益是怎麼理解這個問題的。

錢注說：「此言蜀中將帥也。」他說這不是詠嚴武一個人，這詩是詠蜀中的所有將帥，然後又說：如武者，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才，他可以當安危之寄，國家的安危可以寄託在他身上。但是他說這首詩

正好是用嚴武這一個正面的形象，來反襯其他的將領，所以後面說「而今之非其人，居可知也」，居，就是明白無誤的意思。實際上是指這些人，如：崔旰、郭英義、柏茂琳、李昌夔、楊子琳、杜鴻漸等，都是當時除了嚴武之外，先後在四川駐紮的將領。這些人或者是缺乏才能，或者是個人素質不好、不忠於朝廷等等。他們在鎮守四川的時候，地方非常動亂，不但不能消除邊亂，不能抵禦外侮的侵略，而且連內部都始終不安定。所以錢謙益認為這首詩突顯出嚴武有才幹能夠鎮定四川，把軍隊管得很好，反襯其他的四川將領都沒有做到這點。因此他認為五首諸將詩的主題還是統一的。也就是杜甫在前面四首詩裡分別批評其他將領，在第五首就舉出一個反面的例子、舉出一個好的將領來作為反襯，來批評當時其他四川的將領沒有做得這麼好。最後兩句說「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就是西蜀這個地形特別險，因為那個北邊有劍門關，東邊有三峽，水路陸路都非常難進去，很容易形成割據的，所以要鎮守這樣的地方，要對國家有利，需有一個出色的英才。所以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說除了嚴武此外其他的將領都不能做到這點。我讀了以後認為像錢謙益的這種理解，如〈諸將〉五首之五的這種反諷，他是深入的閱讀，西方的文論中間有一種理論叫做細讀，新批評派主張細讀文本。從這樣方面說，錢謙益可以說是真正細讀文本，他將杜詩的比較深刻的內涵揭示出來，這樣一來，對我們對了解杜詩、評判杜詩，顯然是有利的。

而這種注解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學者所能達到，一定要對文學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時了解作品的背景，對於唐朝的歷史、地理需要擁

有非常熟悉的知識，才能做好。但我們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錢謙益注杜詩的成功之處確實是在於他看得深，他對於作品理解深入一層，但是它的缺點，這本書的敗筆也正在這裡。有的地方他求之過深，用我們今天的話叫做「過度闡釋」，就是文本肯定有內在的蘊涵或者義理，你可以揭示或者深入，但是不能求之過深，不能過度的闡釋，過度的闡釋往往就會走向反面。

我們也舉一個反例，就是這首〈洗兵馬〉，〈洗兵馬〉也是杜甫非常重要的作品，是在唐朝的軍隊收復長安，原來是安史叛軍攻占長安，長安淪陷，後來唐朝的軍隊在肅宗的領導下，收復了長安，杜甫跟隨著朝廷一起回到長安去，這個時候唐皇朝展現出快要走向中興的趨勢，因為叛亂快要被平定了，朝廷好像一切都欣欣向榮，慢慢的走上正軌，國家漸漸安定。杜甫當然非常高興，杜甫最關心的就是國家的命運，所以他就寫了這一首〈洗兵馬〉。〈洗兵馬〉裡面有沒有諷刺的意思呢？是有的。但是錢謙益的註解、錢謙益的理解，就把這首洗兵馬整體性的解釋成諷刺，他說這首詩啊，表面上是歌頌，歌頌我們唐皇朝已經收復了長安了，將來國家要走向太平了，實際上是諷刺，那麼是諷刺什麼呢？錢謙益認為〈洗兵馬〉是諷刺唐肅宗，「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子道就是做為兒子應該盡的義務、應該負的責任，就是諷刺肅宗不能盡孝道，當一個好兒子。「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就是說由於唐肅宗猜忌唐玄宗，他也不信任唐玄宗遺留下來的的大臣，所以也就不能夠致太平。

我們稍微回顧一下，唐肅宗跟唐玄宗之間的父子矛盾問題。安史之亂發生以後，唐玄宗匆匆的西逃，逃到馬嵬坡的時候，發生了馬嵬坡兵變，楊國忠被殺掉了，楊貴妃也被處死了，唐玄宗繼續西奔，一直逃到四川的成都，而當時做為太子的唐肅宗就被留下來，很多人認為如果太子跟著皇帝一起逃走了，這裡的軍隊就群龍無首，沒有人指揮，沒有一種力量來抗衡叛軍，所以大家就把唐肅宗留下來。留下來不久，唐肅宗就自己宣布登基了，尊唐玄宗為太上皇，這個國家的權利就歸肅宗了。所以肅宗登基，他的皇位不是玄宗主動傳給他的，玄宗退為太上皇，是一種被動的無奈之舉。這樣一來，他們父子之間就產生了矛盾。皇室這個政權之爭會使所有人都變樣，所以一到政界，人就變樣了，不像普通人了。皇室也是這樣，普通老百姓的父子關係一般不會走到這一步的，但一到皇室就這樣了，要爭權奪利，所以父子關係就非常的麻煩。後來收復長安以後，唐肅宗先回長安，唐玄宗後來也回到長安，以一個太上皇的身分。有人說不是肅宗本人的錯誤，是張皇后的錯誤、是他們身邊一個宦官叫李輔國的錯誤，實際上當然是唐肅宗的問題。所以唐玄宗和唐肅宗在收復長安以後，他們父子間的關係非常的微妙，其中是有矛盾的。而且實際上後來唐玄宗是被軟禁起來，不許他自由活動。因為唐肅宗怕萬一老臣復辟把政權奪回去了怎麼辦？

到了公元 762 年，唐玄宗、唐肅宗去世了。他們是死在同一個月，都死在公元 762 年的四月，唐肅宗是比唐玄宗晚死，就是作兒子的在父親死後過了十四天也死了，一般來說，歷史上兩個重要人物他們死

得非常靠近，裡面是有曖昧的事情，是有種說不清楚的事情。我們看後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清代慈禧太后跟光緒皇帝兩人是同一天去世，兩人中一定有一個人是非正常死亡。由於文獻無徵，這個秘密恐怕永遠埋藏在前清的故宮裡面，但是按照情理推測，光緒皇帝的死絕對不是正常死亡，慈禧快要死的時候認為不能讓光緒再活下去，或者是慈禧身邊的人覺得不能再讓光緒活下去，所以一定要讓他同時死，所以光緒說不定是在慈禧斷氣前就被用某種手段害死，但是我們說不清楚，歷史上有很多問題，特別是宮廷陰謀類的，往往因為沒有史料，外人無法得知，缺乏明顯的記錄，這些秘密永遠埋藏在陰森的皇宮裡。唐肅宗跟唐玄宗的關係也是有諸多疑問，但是我們現在不講，我們現在回到〈洗兵馬〉這首詩來。

問題是杜甫寫洗兵馬的這個時候，就是唐朝剛收復長安，肅宗和玄宗先後回到長安，整個朝廷還沉浸在收復國都的喜悅氣氛之中，杜甫寫〈洗兵馬〉是不是主要在諷刺唐肅宗？那麼我覺得這個地方呢錢謙益是求之過深了。所以我們現在閱讀〈洗兵馬〉，〈洗兵馬〉比較長，是一首七言古詩，我們現在沒有時間細講，我們閱讀〈洗兵馬〉，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洗兵馬〉的字裡行間，杜甫主要是抒發了一種喜悅之情。他一心盼望國家太平，希望國家沒有戰爭，老百姓能安家樂業，農民好好的耕種，婦女在家養蠶織布，他希望有這樣一個太平安定的社會環境，叛軍已經被我們打敗了，首都已經被收復了，從此就不需要戰爭了。所謂「洗兵馬」，就是把武器都沖洗乾淨收進倉庫，從此天下太平不用戰爭了。因此這首詩的主題絕對是歌頌的，絕對是

表示杜甫的喜悅之情。至於說詩中有幾句詩寫到了當時不太正常的情況，寫到了當時唐軍收復長安之後，有一些並沒有許多功勞的人紛紛來邀功，來求皇帝的功賞。裡面也有幾句是希望唐肅宗能夠更孝順唐玄宗、對他更有禮貌。但是全詩的最主要的跡象，無論如何不能解釋成是諷刺，而應該是歌頌。但錢謙益就是一口咬定這首詩就是諷刺，這個歌頌都是表面文章，這首詩的主題就是諷刺唐肅宗。錢謙益的這番話，他對這首詩的理解，他自己是非常得意的。

我們看講義上所引的〈草堂詩箋元本錢序〉，這是錢謙益自己寫的序。當然他裡面不能自己說我這個注作得好，他引用他的族孫錢遵王的話，錢遵王是他的同族的人，是他的族孫，錢遵王對錢謙益說：你對杜詩的理解真是了不起，了不起到什麼程度呢？他說你是「鑿開鴻蒙，手洗日月」，就是原本杜詩是籠罩在一片煙霧之中，混沌一氣，大家都不理解，你就用手把他鑿開來了，原來杜詩像日月一樣蒙著灰塵、不乾淨，沒有光彩，你現在把它洗乾淨了。所以這樣的理解應該大書特書、昭告萬世，就是在學術史上、在杜詩闡釋學史上永遠傳下去，因為你功勞太大了。這幾句話當然是錢遵王說的，但是問題是錢謙益自己寫的序言，把錢遵王的話給引進去了，說明他也是認可這幾句話，覺得對於〈洗兵馬〉的深層閱讀，超越前人，人家都看不出來，只有我看出來。因為我們普通的人一讀〈洗兵馬〉都覺得喜氣洋洋，是一首歌頌的詩，怎麼會全部都是諷刺呢？他就是一種深層閱讀。我覺得這種地方正是錢注的精華。好的地方是他的深層閱讀，他的不好的地方、他的缺點也是他的深層閱讀。儘管是像〈洗兵馬〉這樣我覺

得是誤讀，有缺失。但是總的來說，錢注確實是一部學術水準相當高的杜詩注。現在我們如果想要完整的、比較詳細的了解一下杜詩的意蘊，了解一下某些杜詩包含着怎麼樣的意思，那麼錢謙益的杜詩注是不可缺少的材料，大家一定要讀的，他確實有水準。

上面講了錢謙益的注，朱注待會再來介紹，我們先來介紹錢謙益、朱鶴齡先合作後分手的這個過程，把過程看清楚，我們就能看清他們是非了。

剛才說錢謙益比朱鶴齡年長 24 歲，錢謙益逝世的年代也比朱鶴齡早十九年，兩個人有這樣的時間差距，所以在兩個人發生矛盾以後，當然各人出各人的注本了。朱注本印行的時候錢謙益早就死了，錢謙益已經死了六年了，因此這裡有個很有趣的事情。我引了洪業先生的一段話，洪業也叫洪煨蓮，這個人 49 年之前是在北平的燕京大學的，就是哈佛燕京學社，49 年以後燕京大學解散，哈佛燕京學社遷回哈佛去了，洪業也回到哈佛大學去了。他作過一個很好的書叫《杜詩引得》所謂引得就是 index，就是索引的意思。這本書現在已經完全沒用了，現在我們用電腦索引。在沒有電腦的時候這個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要了解杜詩某個字出現過多少次什麼的，查一個引得就查出來了，洪業《杜詩引得》的序非常有意思，他說到了錢注和朱注的關係，他說錢謙益跟朱鶴齡為了杜詩注，兩個人先合後分，鬧翻以後彼此指責對方，但是問題是後來錢謙益年長，他先去世了，錢謙益死了以後，朱鶴齡又活了十九年，錢謙益的書也是先刻出來，朱鶴齡的書後刻出來。所以他說後來形勢對朱鶴齡有利了，因為錢謙益死了

朱鶴齡還活著，錢謙益不能開口了，朱鶴齡可以再罵他，所以洪業在這裡說「嗚呼，昔人云後生可畏，後死乃尤可畏也」。後死才真可怕，因為兩個人吵架，先死的就沒辦法開口了，活著的人繼續罵你，你沒辦法開口了。洪業這個話說得非常俏皮、說得非常幽默，可是實際上他是說得不對的。我們現在考察錢注朱注的是非曲折，這個因素可以先排除掉，下面說說為什麼。我們來看一看他們兩個人的先合後分的過程。

第一，在明崇禎 17 年（1644 年）朱鶴齡開始注杜詩，請大家對照一下年代，錢謙益對杜詩作一些註解，沒有寫成注本，只寫成兩篇文章：〈小箋〉跟〈二箋〉，這是 1643 刊的，那麼過了一年到 1644 年，朱鶴齡就開始注杜詩了。這個時候是 1644 年，錢謙益已經 63 歲了，朱鶴齡才 39 歲，兩個人年齡相差比較大。再往下推，推到 1650 年，1650 年錢謙益家裡發生一件大事情，就是他的藏書樓，絳雲樓失火了。錢謙益的藏書樓叫絳雲樓，真是莫名其妙。我們都知道藏書樓最怕就是火災，因為古代的房屋都是磚木結構，所以大家看現在還在寧波的天一閣，著名的藏書樓，天一樓取名為天一就是因為易經裏說天一生水，為什麼要水呢？因為水可以救火。所以我們現在看天一閣三進，每進的天井裡都是一個大蓄水池，可以救火。錢謙益他的藏書樓也很有名，他偏偏取名為絳雲樓，絳雲就是紅色的雲，紅色的雲像是描寫火災似的，火很大，像紅色的雲，所以絳雲樓是非燒掉不可了。果然到了 1650 年絳雲樓就失火了。錢謙益的藏書非常了不得，絳雲樓失火是非常的可惜，因為他不是一般的藏書家，他是一個大學者藏

書家，所以他收書的時候非常關注書的質量，他收的都是好書，像杜詩他就有宋元原注本有好幾種，可惜的是隨著絳雲樓付之一炬，這些書都不復存在了。

絳雲樓失火之後，錢謙益的心情也特別不好，因為明代已經變成清代了。他本人在明清之際也做得不太好，也覺得心中有愧。絳雲樓一失火，做學問的資料也沒有了，所以他萬念俱灰。就說要皈依佛門了，因為中國人相信宗教，特別是相信佛教，往往是在挫折以後才歸心佛門的，他順利的時候不到廟裡去的。歸心佛門之後他就說我萬念俱灰，所以原本準備做的學術事業他也不做了，比如說原來要給杜詩做注解，這個時候也不做了，這些事情都停下來了。這時到了1650年。

再往下推，到了1654年，就是又過了四年，錢謙益碰到了朱鶴齡。兩個人相遇以後，因為錢謙益在南明是禮部尚書，非常大的官，雖然他在清朝不做大官了，但是還是富豪。而朱鶴齡呢是一個窮書生，無以為生，家裡面沒什麼產業的窮書生，又年輕，而錢謙益碰到朱鶴齡還比較欣賞他。朱鶴齡就把自己注杜詩的初稿給錢謙益看，錢謙益欣賞他，所以第二年錢謙益就把朱鶴齡請到他們家去做家庭教師，古代時候沒有公立學校，家裡頭子弟讀書怎麼辦呢？請一個人來做家庭教師。所以錢謙益就把朱鶴齡請到常熟他的家裡，教他族裡的一些小孩。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朱鶴齡在錢家作家庭教師的這兩年時間，錢謙益看到朱鶴齡為杜詩作的注解，他就想到我原本也有為杜詩作的注解，但不是很完整，不如做成一個完整的書，所以就把他的初

稿交給朱鶴齡。說我這裡有一些初稿你拿去，你在這個基礎上做補充、做整理，最後做成一個全面注解的書。也就是說，兩個人要合作注杜。

合作的時候，他們兩個人的姿態是不一樣的，錢謙益是居高臨下，「我是大學者、學問大，我有些意見很好，交給你。具體的字句典故不用我做，那些小學問的人也可以做的，你去做，最後弄成一個完整的注本」。過了一兩年之後朱鶴齡也回家去了，不再在他家做家庭教師了。朱鶴齡回家後就非常的努力，作這個注解。

又過了幾年，到 1657 年以後、1662 年以前，詳細時間我考查不出來是在哪一年，反正就是在這幾年之間。朱鶴齡就從吳江（朱鶴齡家在吳江，離常熟大概有三百里遠）寫了一封信給錢謙益。告訴他杜詩注基本上做完了，過不久再交給你。錢謙益這個時候已經 75 歲到 80 歲之間了，年紀比較大。他一聽到說朱鶴齡來信說這個注已經做完了，兩個人合作的，他很高興，他還沒有看到朱鶴齡交來的全稿，就寫了一篇序言，說我們兩個人怎麼合作做這個書。寫好序言又過了一段時間，到了 1662 年，朱鶴齡把他的原稿全部送到錢謙益這裡來，錢謙益看到了大為不滿，非常不滿意。他覺得這注本質量太差了，我跟你合作，作得這麼糟，把我的名聲也影響了，就好像師生兩個人合作寫一篇論文，老師先說了一個意見，同學去寫，卻又寫得不好，老師一看到就說這麼差，怎麼可以署我的名字呢？他就不高興，兩個人就鬧翻了。

鬧翻以後，錢謙益就要朱鶴齡把原稿交還。朱鶴齡是把原稿交還給他了，但是朱鶴齡已經把錢謙益原稿這些話寫到他的注本裡面去了，古代沒有著作權的概念，他已經抄過去了。錢謙益說我自己來作注本，朱鶴齡也繼續作他的注本，因此兩家後來分手以後，情況就是這樣子的。錢謙益的注本當然是根據他部分的初稿繼續做，朱鶴齡就在錢朱合作的初稿上再繼續做。因此後來變成了兩種注本以後，朱注本中間必然有錢謙益的意見，而錢謙益的注本中間基本上是沒有朱鶴齡的意見的。就是錢謙益看不起朱鶴齡，認為你這種學問，人人都知道，畢竟錢謙益有五百多首詩根本不注。「這種典故人人都知道，哪裡需要注？」我一直覺得錢謙益是不對的，他是一個長輩，年長 24 歲，又身為學界的領袖，朱鶴齡是個年輕人、是個後輩。所以錢謙益說很多難聽的話來諷刺朱鶴齡的注，「太可笑了，看了以後要把人笑死了」。「問資嗷嚙，引人噴飯」就是說看了朱鶴齡的注，要笑得把飯噴出來了。忍不住，質量太差。兩個人吵得很厲害。後來就成了我剛才介紹過的，形成了兩個注本。那麼問題就來了，我們後人怎麼看待這兩個注本，我們要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判，學術史上的問題我們要有一個結論、一個判斷，到底是非功過怎麼樣，我們來看這個判斷應該怎麼做。

下面就提到簡恩定先生的這本書，《清初杜詩學研究》臺灣同學應該有人讀過的，1986 年就出了。我為什麼要在這裡提這本書呢？我覺得簡恩定先生這本書是有他的功勞的，是有他的價值的。但是這本書在談到錢注跟朱注的關係，卻有一個重大的失誤，我們來看這個

失誤是怎麼來的。這本書用了比較多的篇幅，我現在記不清了，反正有好幾十頁，具體來談一個問題，談什麼呢？就是他分析了錢注朱注兩種注本，一一分析之後，他就有一個結論：朱鶴齡的注是抄錢謙益的，錢朱兩個人為什麼會鬧翻、錢謙益為什麼要罵朱鶴齡，為什麼以後不合作了，就在於朱鶴齡抄襲了錢謙益，又不注明，不說是抄的，這樣錢謙益就不高興了。但是簡先生的這個判斷是不對的、是錯誤的。

我們舉一個例子，他舉了好多例子，情況都一樣的。我們只要看第一個例子就知道了：杜甫有一首早期的詩叫做〈遊龍門奉先寺〉，就是現在洛陽龍門的奉先寺，龍門石刻就在那個地方。有一句詩叫「更宿招提境」就是「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招提就是寺廟，就是我早上遊這個寺廟，晚上又住在這個寺廟裡，宿在這個寺廟的範圍之內。這裡要注「招提」這個詞，因為招提不是一個一般的詞，我們讀了會想「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叫做招提？」我們看看錢注跟朱注。錢注是引《僧輝記》這本書，他說「招提者，梵言（梵言就是梵文，印度語）拓門提奢（就是這個梵文本來念拓門提奢的）」下面我把梵文的拉丁語轉寫打在講義上面，我不懂梵文，就查了字典，他的拉丁語轉寫是這樣寫的，漢語翻譯成拓門提奢，拓門提奢是什麼意思呢？他說「唐言四方僧物」唐言就是中國話，古代叫唐言，就是中國話是稱這個詞叫四方僧物，就是四方的和尚、四方的佛教徒都到這裡來。「後人傳寫以拓為招」本來是拓門提奢，後來傳寫之後，把「拓」字寫錯了，寫成「招」，然後又因為原來的詞太長了，四個漢字構成的，要簡化，漢語都是以簡潔為標準，後來省掉了中間的「門」、「奢」兩個

字，就變成了「招提」了。「招提」實際上是一個不好的翻譯詞，聲音也注的不準，他是一個梵語，所以「招提」就是指四方寺院、佛教的寺廟，四方的佛教徒都到這裡來，可以在這裡修行，可以在這裡居住。這番話當然也不是錢謙益本人的話，他是引一本書叫做《僧輝記》。假如我們翻一翻朱鶴齡的注，在這個地方是一模一樣的，也是引《僧輝記》，也是說「招提者，梵言拓門提奢」。問題就來了，簡恩定先生的判斷就是：錢注在前，朱鶴齡是看到錢注的初稿的，錢注已經注了招提是這個意思，朱鶴齡也引同樣的書，又不說是根據錢謙益的注的，那麼就是抄襲的、是剽竊他的。抄襲跟剽竊當然是學術上不好的行為，所以他說錢謙益就生氣了，朱鶴齡這樣做是不對的。但是簡恩定先生的判斷不準確，他忽略了杜詩註解不是從錢謙益開始的，更不是從朱鶴齡開始的。

注釋一個古人的作品，特別是像杜甫這樣的作品，歷史上有很多人做注解，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一代一代都有人做注解，注釋是有繼承性的，就是後代的注家跟前代的注家，是可以延續的，照我們今天的學術規範應該要說明「這是某人的意見」，但是古人對一些常見的典故出處，一般也不用說明最早是何人注出的，我們看清代其他注家也都是這樣，這是常識性的東西，所以古人這樣注了。而且引《僧輝記》的這段話來解釋「招提」的這段話，根本不是從錢注開始，在南宋人的注中早就有了，最常見的就是《九家注》，就是南宋的郭知達注的《九家注》，是杜詩的一個注本。我們現在去查一查《九家注》，這段話一模一樣，也是引《僧輝記》說「招提者，梵言拓門提奢」等

等。可以說，不但朱鶴齡是照抄前人的，錢謙益也是照抄前人的，因為在這種地方並沒有獨創性可言，就是簡單的一個出處、一個詞語，大家都是一樣，前人注了後人也還是這樣注，所以這個地方僅僅根據朱鶴齡注跟錢謙益注是一樣的就來斷定朱鶴齡是抄襲錢謙益的，這是沒有根據的。簡恩定先生的書最大錯誤就是在於他舉了二十多個此類例子，實際上在宋人的書裡都有了，一模一樣。因此，我們不能根據這些材料，就說朱鶴齡抄襲錢謙益，實際上兩個人都是延續南宋人的注本。說到這點以後，我們就可以來評說錢注以及朱注的是非功過了。

再請大家看到洪業的話，我覺得這一段話說得非常好。洪業說：「雖然，注杜之爭，乃錢、朱二人之不幸」這是說得不錯的，就是因為注杜詩引起的糾紛、引起兩個人反目，互相說難聽的話，對他們兩個人都是不幸的。朱鶴齡當然當時受了很多氣、窩囊氣。錢謙益當時罵他，他也不大敢還口，他是很不幸、很鬱悶。但是對錢謙益來說這也是對他名聲的極大損害，一個前輩怎麼用這麼難聽的話說人家，而且很多話說的也沒有道理，所以兩個人都是不幸。但是洪業下一句話說「而杜集之幸也。」說雖然對這兩位注家是不幸的，但是對杜甫的詩集是有幸的，因為學術的事情，「考證之學，事以辯而愈明，理以爭而愈准。」就是學術的事情一定要雙方來辯論，不同的意見來充分的討論，兩方互相爭論，爭到最後就把我們的認知深化了。很多東西原來我們理解並沒有這麼深刻，但是我跟對方爭論了，對方說什麼、我說什麼，兩個人爭吵，把我們雙方的認知都互相深化了，爭得越深，道理越清楚。

下個月會到貴校演講的周裕鍇教授，他在東華客座，我跟他好朋友，我跟他爭論過。我們兩個人對於黃庭堅脫胎換骨的理論，到底是不是他說的，還是釋惠洪說的，我們曾經在會議爭論過，那次會上主持人刻意把我們安排在一起，兩個人爭辯，後來我們的文章同一期發表在文學遺產上面，我覺得我跟裕鍇兄通過這次爭辯之後，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了解有了昇華，沒有爭的時候我們的理解都比較淺，爭了以後就比較深。洪業這段話也是這個意思，錢朱因注杜而爭，所以對杜詩的理解就昇華了。我們看看事情是不是這個樣子。我覺得，是這個樣子的，事情說得很好。

下面看錢謙益生平的一個記錄，在季振宜的〈錢注杜詩序〉中間，錢謙益的杜詩注是在錢謙益身後才出版的。季振宜幫他寫了一篇序，引了錢曾說的一段話，錢曾就是錢遵王，是錢謙益的族孫。錢曾回憶錢謙益臨終的時候，他病重了，所以躺在床上。錢遵王就守在他的床邊，早晚都守在那裡。中間病情稍微有一點空隙的時候，這個主語還是錢謙益，錢謙益從咽喉裏勉強發出一些聲音，因為他快要死了、已經很衰弱了，勉強發出一些聲音來說，說什麼呢？不是交待家裡的財產，是交待杜詩注，他說「杜詩某章某句，尚有疑義」就是某一篇杜詩、某一句注釋還不太清楚，還要再討論。「成書而後，又千百條」就是書已經寫好了，成書以後反覆修改，又修改了千百條。也就是說，他一直到死都始終不放心這個杜詩注，一直在那邊討論，一直要錢遵王把他的意見記下來、繼續修改，「臨屬續」，「屬續」是古代的一個專有名詞，就是快要斷氣的時候，我們現在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死亡，

醫生是說腦死亡，大腦死亡就是死亡了。古人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死亡，是看他是不是斷氣了。看看他還喘不喘氣，他們用什麼方法斷定他喘不喘氣呢？古人用一縷絲棉，一縷很細的絲棉，放在他的鼻孔，他一喘氣這個絲棉會飄動，看到絲棉不動就宣布這個人死亡了。所以，「屬纊」就是一個人臨斷氣的時候，也就是錢謙益在病床上，快要斷氣的時候，他眼睛張開來，「老淚猶濕」，話已經說不出來了，眼眶裡面全是眼淚。

下面一段文章引比較長，錢遵王說，「我就問他：你是不是不放心杜詩注啊？」錢謙益就點點頭，他說不出話，只好點點頭。錢遵王說「你放心，你健在，我們繼續修改；你要是沒在了，我繼續把它修改完。」錢謙益才閉眼。也就是說，錢謙益在臨死之前，最放不下的事情不是他家裡的千萬貫家產，也不是他家裡的如花似玉的柳如是，他的夫人叫柳如是，當時著名的美女，而是杜詩注。他的杜詩注本最後還沒有修改完，他最不放心。說實在的，身為一個杜詩研究者，我讀到這一段話的時候，我相當受感動，因為我對於錢謙益這個人的看法一向是不好的，錢謙益在明亡的時候，清兵南下、攻破南京城，錢謙益作為南明的一個尚書，部長級的官員，他應該殉國的。在一個國家、一個政權滅亡的時候，特別是在被外民族入侵滅亡的時候，老百姓是有權利活下去的，但是你是大官、你據高位、你享厚祿，你這樣的人應該要殉國，你不能苟活下來。錢謙益曾經想殉國，因為柳如是鼓勵他，柳如是這個人雖然是個弱女子，可是深明大義，她覺得應該殉國。所以錢謙益在城破之際曾經走進秦淮河，是南京的河。他應該

要跳水淹死的，但是他走了幾步說「哎呀！水好冷！」又跑上來了。跑上來之後第二天就剃了頭髮去迎接清兵了，投降了。所以，他是一個沒有民族氣節的人。我一向對這個事情很不滿，或者說很遺憾。一個文壇的領袖，一個學問這麼大的學者，地位這麼高，而且已經活到六十多歲了，為什麼不殉國，還要苟活這麼多年。但是當我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看到他為了注杜詩到臨終時候眼睛還不閉，最後一定要錢遵王說了這一段話之後眼睛才閉，把注杜詩作為他終生的事業，這一段話是我非常感動的，作為一個學者，他是盡了責任。

當然，錢謙益注杜詩，是用了他畢生的精力來完成的，為什麼我剛才要提洪業先生那一段話，來說錢朱二人之不幸，而杜集之幸，就在於假如不是因為跟朱鶴齡爭吵的話，假如不是因為跟朱鶴齡先合後分的話，錢謙益根本不會花這麼大的力氣來注杜詩，他本來並沒有這樣的計畫，他自己覺得是寫詩寫文的原創性的文人，注釋之學，一首一首詩、一個一個典故來注，他認為是學問比較小的人來作，他不作的。但是後來因為跟朱鶴齡翻臉了，朱鶴齡要注杜詩，錢謙益又怕我倒沒有注本出來，人家都說「你看他注得多好，你反而都沒有書。」他就一定要爭口氣，硬跟他比，所以他就花終生之力來注杜詩。而且，錢謙益也好、朱鶴齡也好，在他們兩個人翻臉以後，兩個人在注杜詩上面真是用盡心力，就是比平常的注詩花費了更多的心力。首先是兩個人拼命地趕進度，要快，「我要先作完。」作了幾年之後兩個人又不要快，要慢，深怕我的注本先出來了，對方說哪裡錯了，所以要反覆修改，所以要慢。所以後來就拖得很晚很晚才出版。錢謙益的注本

要到他去世三年以後才出版，朱鶴齡的書又過了幾年才出版。這樣一種先爭快後爭慢的態度，就促使他們在杜詩注釋上面精益求精，反覆修訂，深怕有什麼錯誤、有什麼漏洞被對方抓住了，「你學問好什麼？你這樣都注錯了。」他深怕這樣一點，當然錢謙益更怕，朱鶴齡少怕一些。所以這一點對於他們兩個把錢注杜詩和朱注杜詩提升到現在的學術水平，都是非常有利的。幸虧他們兩人吵架，所以後來作得更好。

下面我們就回過頭看一看我今天要講的最後一點內容，就是看朱注的水平到底如何。或者看朱鶴齡在這場學術之爭之間，他的是非功過到底如何。這一場爭論，朱鶴齡受到的損害是非常大的，朱鶴齡受到的損害大是在哪呢？是在於儘管錢謙益以一種非常輕視的、非常不屑的口吻對他進行多方指責，錢謙益給很多人寫信都說朱鶴齡的學問多差、注杜詩注得不好、人品也不好，罵了他很多話，但是朱鶴齡還是忍辱負重的把錢謙益注的內容都收在他的注裡面，因為一開始兩個人是合作的，而且在錢謙益去世以後，朱鶴齡出版自己的書的時候，他在扉頁上還專門用大字印上錢牧齋先生鑑定，就是我這個注本，是錢先生看過的。他是沒有辦法的，錢謙益地位太高了、影響太大了，他不敢擺脫錢謙益。而且他一開始的著作確實是在錢謙益的指導下進行，錢謙益把原稿給他看過，所以朱鶴齡忍受的污辱或者是損害都是相當大的。他在注杜的時候非常刻苦，剛才我說簡恩定先生批評他抄襲，我是堅決不同意的，我覺得沒有。因為在我們看到的朱注本中間，引錢注的地方非常多，就是只要這個意見原來是錢謙益的，朱鶴齡也

沒有把它刪掉，還用了，但是他一定說明這是錢注，說明這是錢謙益的意見。他一一都注明瞭，我們舉幾個例子看一看。

「舟前小鵝兒」這是杜甫的一首詩，杜甫很喜歡小動物，看到船前有一群小鵝在水中游，他就寫了一首詩，說「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就是這個小鵝的顏色不是白的，是黃顏色，這個黃顏色就很像紹興酒的黃顏色，鵝的顏色像酒，我又喜歡喝酒，所以非常喜歡這群小鵝。這兩句話有什麼來歷呢？要怎麼注呢？我們看一看。

錢謙益注了，朱鶴齡也注了。都引了《方輿勝覽》，《方輿勝覽》是南宋的一本地理書，上面說：「鵝黃乃漢州名酒，蜀中無能及者」漢州當時最好的酒就叫鵝黃酒，顏色像小鵝，杜甫這首詩在漢州寫的，所以用這個典故、這個事實來注這兩句，注得比較好。問題是《方輿勝覽》是南宋人寫的，是一部常見書，朱鶴齡的學問雖然境界上不如錢謙益這麼高，但是他記誦非常繁複，就是他讀的書非常多，所以他有可能讀到這本書，這種地方實際上他不引錢謙益的注文也不要緊，你也完全能看到這本書，但是他還是引了錢注，他還是說這是錢謙益先生先注出來的。雖然我也知道《方輿勝覽》，但是他先注出來的，所以他還是引了。這種地方，我覺得他的態度還是比較誠懇的。

下面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他這裡引錢注引了 827 個字，一首詩的注解，錢謙益的注朱鶴齡全部都引了，827 個字前面都標明了錢注，就是錢謙益的意見。所以他沒有要抄襲的意思。下面的例子我省掉了，像〈八哀詩〉這個例子，還有〈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這個例子，朱鶴齡對錢注是有所補充的，錢注注得

不夠清晰，朱鶴齡把它注得更清晰了。或者有些地方錢謙益沒注，像這個「業白」，錢謙益根本沒注，朱鶴齡把它注出來了，而且注得相當正確，所以總的來說，朱注本也許在學術個性上面不如錢注本那麼鮮明，但是他在引別人的意見、注明出處上面態度上面應該都說是做的相當好的。

最後一個例子是比較有意思的，我剛才不是說我不同意簡恩定先生的論斷嗎？說朱鶴齡抄錢謙益的，實際上，在我仔細比勘錢注本跟朱注本的過程中間，我倒是發現一處錢謙益抄朱鶴齡的地方，不是朱鶴齡抄錢謙益，而是錢謙益抄朱鶴齡，讓我們看一看這個例子。這首杜詩題目叫〈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下面有兩句詩叫做「閩風入轍跡，曠原延冥搜。」這裡的關鍵在於「曠原」這個詞，「曠原」這個詞照字面上的解釋當然可說是空曠的原野，但是問題是它可能是一個專有名詞，如果是一個專門名詞就要注。我們先看朱注，朱鶴齡的注引《穆天子傳》：「六師之人畢至於曠原。」《穆天子傳》中間就已經出現了曠原，這是一個地名，而不是空曠的原野，下面還有「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九百里」就是這兩個地方，西王母住的地方，到曠原這個地方，距離千九百里。所以他不是是一片空曠的原野，一片空曠的原野無所謂距離，它就是很空曠，一定是一個地點它才可能有距離，因此朱鶴齡是注了。我們再看看錢謙益的注本，他也注了，錢謙益也引了《穆天子傳》，那是不是兩個人偶然都引了《穆天子傳》，或者反過來說是不是朱鶴齡抄了錢謙益的？不是，這個地方是錢注抄了朱注。我為什麼這樣說？我有根據。就是

在錢謙益寫給錢遵王的信中間，他不是跟他的族孫錢遵王合作在做這個事情嗎？他有一次給錢遵王寫信，裡面說到，他到吳江去，碰到朱鶴齡，兩個人談到杜詩注，意見不合，就吵了起來，他下面引的是朱鶴齡的話，這是錢謙益寫給錢遵王的信中間引的朱鶴齡的話，就是錢謙益跟他吵架時朱鶴齡說的。說什麼話呢？「如曠原二字，出穆天子傳」，就是曠原這兩個字是從《穆天子傳》出來的。「箋注不曾開出，豈亦門生誤耶」，這句話的前提在於錢謙益又批評朱鶴齡這樣注怎麼不好，朱鶴齡就為自己辯護：「我也有功勞，曠原這兩個字出於《穆天子傳》，但是您的初稿中間並沒有注出，我現在把它補進去了，這也是門生我的錯誤嗎？」朱鶴齡自稱門生，他是後輩。所以根據這封信就可以知道，錢謙益的原注本沒有注曠原二字，這是朱鶴齡注的，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錢注本也注了，所以實際上這個發現是朱鶴齡先做出來的，錢謙益是後來補進去的。他實際上是抄朱注的，但是朱鶴齡對此一字不提。朱鶴齡即使在錢謙益死後批評過錢謙益，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錢謙益抄過我的注解，他沒有說過，他還是尊重錢謙益，把他當作一位前輩。

因此照我看來，錢謙益與朱鶴齡因為杜注的事情先合後分，有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後來各自成為一個注本，應該說如果純粹上由學術來說，兩個注本各有千秋，錢謙益的注本以深層解讀為主要的特點，而朱鶴齡的注本以一般出處、典故注得細、注得密，以這為特點，兩者是可以互補的，可惜的是兩個人因為生前交惡、關係不好，說了很多不該說的話，結果就形成了一段公案，後人來評價的時候也往往

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我想做的一番工作就是把這個問題弄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應該說只有我們把一個文本的發生背景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是怎麼回事弄清楚，我們才有可能加深對於文本的理解，也可能使我們的評判更加準確。我之所以會做這番功夫來談錢朱哪年相見，這個不是學術的目的，來談這些主要是想導出一個結論來，最後能讓我們對於錢注和朱注分別都有比較好的認知，大致上就是這樣一點的意見。今天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